现有秩序结构往往是多种历史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混合着人为的设计、对现实的妥协与实践中的走样。“单位”即是这样一个可以借以窥探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政府在社会基层治理应用一角的秩序结构范本。

从“单位”最初模糊不明、无法精确定位的起源之中，便有意无意揭示了“单位”的出现绝非出于一种精心的、全盘的考虑或规划。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其诞生之初即出于暂时性的原因，是政府在总体资源不足时所创制的半自力更生的集体单元（其“只进不出”的特性具有一种提供社会劳工保障，减少不安因素的作用）。由于列宁式政党党政体制对意识形态统一的需求，“单位”也成了执政党对城市基层实现治理、开展政治运动、进行政治教育的基本单位，与前述的妥协性目的构成了“单位”最为重要的两个核心特征。

伴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单位”的前一特征已不复存在，那么前三十年式的“单位”的消亡亦是自然之事。但党政体制对后者的需求并未改变，这一部分“牧羊人”式的职责逐渐过渡到了社区的手中，形成了后毛泽东时代的城市基本治理单元。

本书基本上是贯彻了谱系学框架的研究方法，为“单位”的诸多理论研究提供了优秀的成果。但遗憾的是，正如作者所言，他并不是社会学家，书中缺乏关于“单位”的田野调查资料，因此本书也缺少了关于“单位”的身临其境、更为生动的视角。